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西方经济学说史

——思想的源与流

朱富强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西方经济学说史

——思想的源与流

朱富强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经济学说史：思想的源与流/朱富强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1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ISBN 978-7-5095-7895-7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0-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3393 号

责任编辑：王 芳

责任校对：陈世明

封面设计：肖玉坤

版式设计：王志强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jiaoyu@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82333010 编辑部门电话：010-88190670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30 印张 766 000 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65.00 元

ISBN 978-7-5095-7895-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88190414、QQ: 447268889

前 言

现代学术界对待前人的思想和学说往往存在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相对主义，相对论者把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或多或少地看作对当时状况的真实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合理性；二是绝对主义，绝对论者不仅把眼光牢牢地放在主体的心智发展上，把它看成从错误到真理的稳步前进过程（布劳格，2009）。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2011）⁵ 则指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家站在相对论者的立场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绝对论者的地位得到了强有力的巩固。”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者的思维明显带有绝对主义特性，他们往往以更好或更坏的术语给不同时代的理论排序，乃至把过去的理论视为“死人的错误观点”，并且认为一个理论一旦被更进步的理论所取代，再去探讨旧理论就毫无意义。究其原因，现代主义经济学者往往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学的硬科学，不仅以某种“客观”的“科学”标准来审视和解读学说史上的各种理论，而且认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主要把时间用来探讨更进步的理论以及检验理论更准确的方法。

基于这种科学主义信条，现代经济学不仅抛弃了过去与其他社会科学相融通的发展路径，甚至也抛弃了自身的演化历史。相应地，现代经济学教材往往将历时性演化的理论放在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抽去了理论的人文性和主观性，忽视了理论的传承性和历史性。这样，经济学说史开始不再受到关注，以致包尔丁提出了“萨缪尔森以后谁还需要亚当·斯密”的问题。然而，考察经济学说史就可以发现，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和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接受现代经济学教材的教育，经济学初学者往往不知道这门学科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想当然地以为经济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如此。

一般地，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都是渐进的，学术史对任何学科的理论发展都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米塞斯说，人类历史就是思想史，正是思想、理论和学说指导着人的行为，决定了人们的目标和为达到这些目标对手段的选择。思想史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①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不仅认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致用之学，而任何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是基于特定社会环境的；②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并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静态存在的，只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展现出来，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社会经济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③社会经济现象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每个人所能够穷尽的思考只能局限于很小的一个方面，而要了解人类社会的全貌，就必须努力承袭和契合前人的研究。不幸的

是,随着功利主义和媚俗主义学术风气的盛行,经济学说史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却日益边缘化了。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首先要从经济思想的教学开始,需要重视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和研究。

正是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系统梳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经济学科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进而可以洞悉经济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进而更全面地剖析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关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对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凯恩斯(2001)¹⁷⁸就归纳了3个方面:“第一,证明和检验那些本身不依赖历史材料的研究结论;第二,提醒人们注意经济学说的现实应用性的局限性;第三,为理论化的经济学说的逻辑结论提供一个基础。”有鉴于此,本书致力于对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成长历程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阐述,集中剖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流派的历史渊源、哲学思维、理论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而也对各经济流派之间的传承和革新展开系统地挖掘和比较,从而使读者能够全面而系统地认识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科。

事实上,“为往圣继绝学”是笔者毕生所持守的学术旨向和理念,相应地,本书在梳理和阐述经济思想的成长过程中也致力于实现如下4个“传承”。

第一,重视经济思想历时演进的传承。知识和思想的累积是渐进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是渐进的,经济学说史就体现了经济学科的成长过程。在这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汇成当今经济学科的思想溪流是多方面的,不仅来自各领域和各地域的学者,也来自各时期的学者。因此,经济学说史上的经济思想具有强烈的时空性,却又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中不断再现。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思想本身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只有是否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事实上,经济理论的探究不是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简单否定,思想进步不是对传统思想的革命,不是以一种进步学说代替被否弃的学说,而是体现为对前人认知的推进和对人类思想的深化。所以,斯皮格尔(1999)²说:“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人的思想中学到和吸收一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经济思想的发展看成是逐渐进步的过程。”同时,经济思想在综合成整体性的理论体系之前,大多数思想都是被零星地提及,这些思想的最初提出者也许并不知名,却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罗斯巴德(2012a)⁴就指出,通常所谓的“小”人物在任何思想观念的发展中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少数顶尖的思想家。因此,本书注重经济思想和学说的历时性演变,努力挖掘思想和学说的起源,从而提供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二,重视经济学大师思想的传承。能够通过沉思而形成系统的思想乃至理论体系都是人类历史上的智者,是理论界的大师,人类思想就体现在那些大师的经典著作上。因此,梳理经济学说史的发展时,就特别要关注那些大师的思想及其传承关系。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帝王的英雄史,也不是一般的群众史,而是大师们的思想传承史,是这些思想大师总结、提炼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所不断积累的理论和知识,并把他们传授给社会大众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和思想史根底,这些大师们对社会经济问题往往观察得更为深入和细致,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和长远。同时,他们在汲取古人的深邃思想的同时,在现世社会却往往显得孤独,甚至不被理解。哲学上就有学者指出,超过康德,可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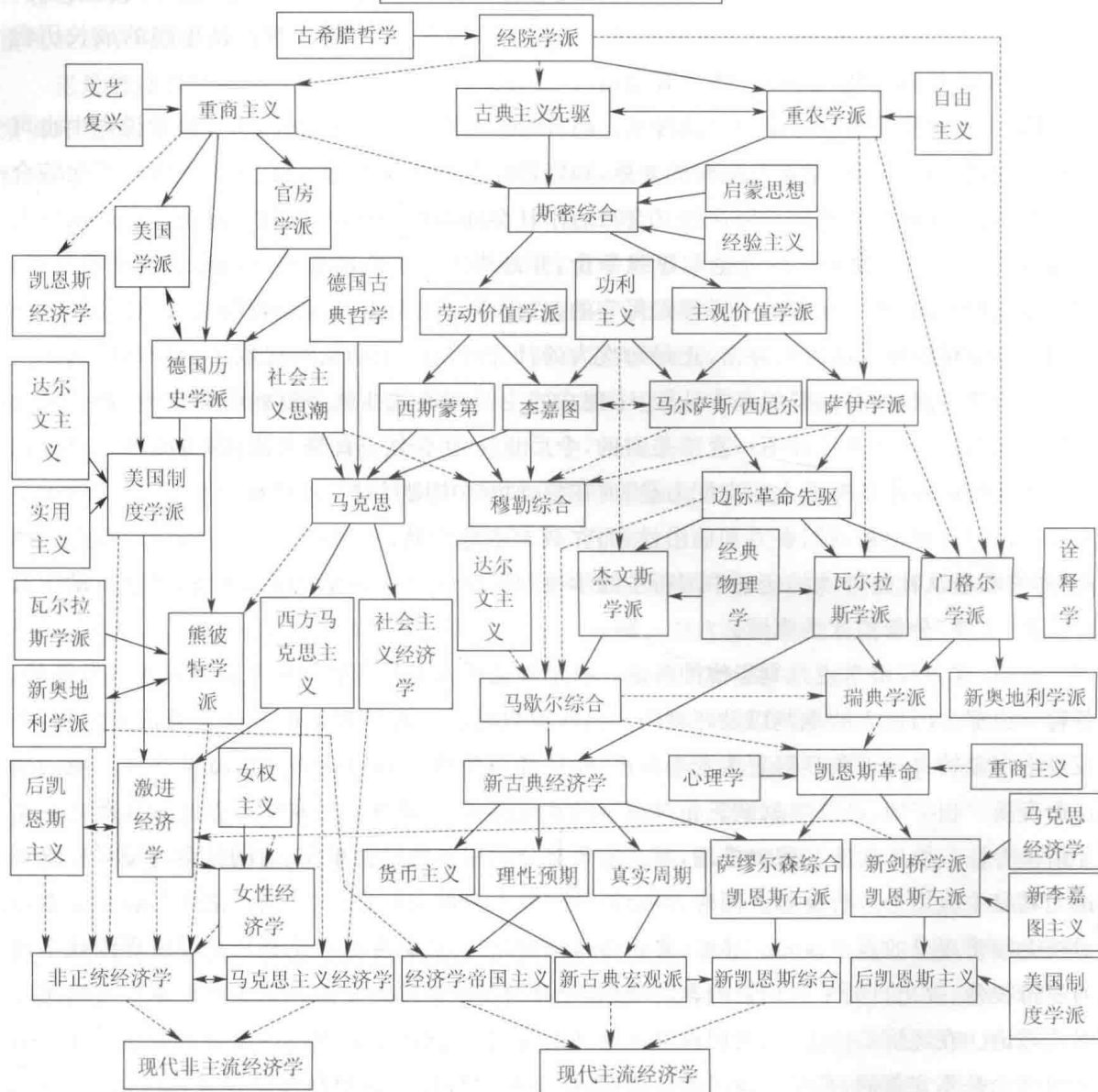
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同样,在经济学领域,也决不能跳过亚里士多德、斯密、穆勒、马克思、西斯蒙第、李斯特、门格尔、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没有跳出斯密以及马歇尔所建立的体系。因此,本书在梳理经济思想的成长历程时,特别关注挖掘这些大师的思想及其命运。

第三,重视经济学说主流嬗变的传承。经济思想具有强烈的时空性,从经济学说史中也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主流”学说和流派的变更,如经济学说史中就呈现出了五次革命和五次综合的发展轨迹。同时,思想的发展往往又会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动,从而社会环境的每一次巨大变动都会产生一场大规模的理论和思维争论,并最终产生了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阵痛性变革。加尔布雷思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最终促成了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基于这一点,就有这样的基本认识:①现在的主流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②主流理论并不一直都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③主流理论只有在—一个不变的世界才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而在变动世界中则日益与社会相脱节;④理论处于非主流地位时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沿性,而在成为主流后就往往蜕变成一种陈腐和教条。因此,本书积极从社会环境的变动中剖析主流学说的暂时性以及主流学说的嬗变,从而有助于我们摆脱“主流”分析范式的束缚。

第四,重视经济学说批判思维的传承。科学理论根本上是在批判中才得以完善和发展的,各种学说都会因他人的批判以及环境的冲击而得以检视。经济理论的发展尤其需要批判,不仅经济现象较自然现象显得更为变动多样,而且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换。相应地,经济学就缺乏相对稳定的常规范式,无法像自然科学家基于常规范式在象牙塔里专注于模型构建和逻辑推理,而是需要充分利用新的经验事实、新的社会环境对传统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为己之学”,目的是增进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真正认知。显然,要获得认知的增进,就需要通过剖析以前经济理论或学说的逻辑视角、提出目的来认识它内含的缺陷,没有对理论缺陷的足够认识也就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的理论悖论,而悖论的存在显然就意味着原来的理论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本书在对待过去的思想和学说时,就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了解、接受和传播层次上,而是注重多角度的综合、比较和反思并从中理清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

当然,思想和学说本身就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提炼,理论必然来自人们的生活,理论的大变革也源于社会形势的巨变。相应地,经济学说的每次大变革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为此,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和研究也就要将抽象的经济理论与特定时期所面临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起来,以社会经济情势的发展变动为主线来探究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孕育和成长。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演变的逻辑,本书将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划分成五大部分:前古典主义经济学、古典主义经济学、边际革命时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下图简要反映出了各经济学流派的思想渊源和经济学说史的演化脉络。

西方经济学说的演进谱系



最后,本书的撰写适应了当前国内经济学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经济院校越来越不重视经济学说史的教学。相应地,不仅了解经济学说史的青年经济学子越来越少,与时俱进的经济学说史教材更是严重缺乏。因而,本书要面向这样两类人群:一是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二是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对有志于从事理论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说史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本书也值得一读,因为它有助于提高对经济学科的系统性认知,可以拓展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思维,而且,从这本书中也可以发现不少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

此外,即使对那些希望系统了解经济学说及其发展历程的经济学爱好者来说,本书也不乏裨益,因为本书提供了全面了解经济学思想的框架路线。此外,对那些希望更深刻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并由此认识纷繁芜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志士,尤其是对那些有志于从事理论经济

学研究的学人来说,则可以进一步阅读本书的姊妹篇《高阶西方经济学说史——思想的鉴与释》。事实上,本书在思想和学说阐述过程中列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思考题,而那些极具启迪意义的思考“答案”则在《高阶西方经济学说史——思想的鉴与释》一书中。尤其是,《高阶西方经济学说史——思想的鉴与释》一书以延伸思考和问题解析的形式将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社会所积累的其他思想以及与当前的社会经济实践进一步结合起来,从而将“经济学说史”打造成一门“致用之学”。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学说都是为了理解 and 解决现实问题,笔者对这两部书的撰写也正是基于这一旨趣!

朱富强

2017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前古典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

1 古希腊时期的经济思想	2
1.1 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思维特质	2
1.2 古希腊三大哲人的社会经济思想	8
1.3 希腊化时期的三大社会哲学思潮	18
2 罗马—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24
2.1 古罗马时期的社会经济思想	24
2.2 早期基督教的社会经济思想	27
2.3 天主教会体系的形成	30
2.4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33
3 资本主义崛起期的重商主义	41
3.1 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	41
3.2 重商主义的兴起和特点	54
3.3 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	57
3.4 重商主义的思想演进	61
4 资本主义崛起期的重农主义	67
4.1 重商主义后期的思想变革	67
4.2 重农主义的兴起和特点	70
4.3 重农主义的两大思想先驱	73
4.4 重农学派的两大关键人物	78

第二篇 古典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

5 古典经济学的起源和确立	85
5.1 古典经济学的理解和产生背景	85

5.2 古典经济学思想的英国先驱	88
5.3 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斯密	96
6 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117
6.1 古典经济学的推进者李嘉图	117
6.2 李嘉图学派面临的挑战和解体	127
6.3 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约翰·穆勒	131
7 古典主义核心思想的批判	146
7.1 英国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舍弃	146
7.2 法国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舍弃	160
7.3 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者	168
7.4 崇尚保护主义的美国学派	177
8 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183
8.1 德国早期的历史主义	183
8.2 德国的旧历史学派	191
8.3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	196
8.4 新历史学派的发展和解体	200

第三篇 边际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

9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207
9.1 边际革命的背景和革新	207
9.2 英国的边际效用思想萌芽	212
9.3 法国的边际效用思想萌芽	214
9.4 德国的边际效用思想萌芽	219

10	边际主义的数理学派	223
10.1	英国学派的边际主义思潮	223
10.2	洛桑学派的边际主义思潮	234
10.3	美国学派的边际主义思想	245
11	边际主义的奥地利学派	252
11.1	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特点	252
11.2	奥地利学派的三大奠基人	257
11.3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传播者	272
11.4	奥地利经济学的现代发展	283

第四篇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

12	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	294
12.1	马歇尔的经济学认知	294
12.2	价格和分配理论	301
12.3	要素需求和企业生产	308
12.4	国际贸易与货币理论	312
13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313
13.1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兴起	313
13.2	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319
13.3	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	328
14	瑞典学派及其他新古典主义思想	332
14.1	瑞典学派的先驱	332
14.2	瑞典学派的确立	339
14.3	新古典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	346
14.4	新古典时期的经济周期理论	350
15	美国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	356
15.1	美国制度主义的背景和特点	356
15.2	美国制度主义的创建者凡勃伦	361

15.3	美国制度主义的两大早期代表	378
15.4	美国制度学派的后期领袖加尔布雷思	384
15.5	美国制度主义的演化及衰落	390

第五篇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三大流派

16	凯恩斯主义的内部之争	396
16.1	凯恩斯的经济学体系	396
16.2	新古典综合:主流凯恩斯右派	402
16.3	新剑桥学派:凯恩斯主义左派	410
17	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批判	419
17.1	新古典宏观学派的产生	419
17.2	弗里德曼开创的货币主义流派	420
17.3	卢卡斯领衔的理性预期学派	425
17.4	供给学派与真实周期理论	429
17.5	其他自由主义学派	434
18	新凯恩斯主义的折中	441
18.1	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特点	441
18.2	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理论	444
18.3	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理论	450
18.4	新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理论	453
18.5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和周期理论	457
18.6	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评述	461
	参考文献	464

第一篇

前古典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 17 世纪中期到 18 世纪末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社会就已经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有社会流通和交换。相应地,那时的许多思想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反映出的经济现象都做了观察和思考,不少人提出了有意义的思想,一些见解成为以后经济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尤其是,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法学和中世纪的神学为西方经济学思维奠定了基础。例如,就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无形的手”而言,尽管这一发现根本上归功于亚当·斯密的论述,但对市场的重视也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熊彼特就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基本架构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法哲学:①经院哲学的学说通过 17 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家格劳修斯和普芬道夫等传到了斯密;②斯密熟知的重农主义也饱受经院哲学的影响,魁奈说话就常常像阿奎那(布劳格,2009)¹⁷。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经济思想的出现往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此时商品价值观念已经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而产生了。不过,当时的学者对商品交换的内在关系的认识还很粗糙,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财富分配、公平价格、高利贷等论述。尽管如此,其中一些看法却成为后来价值论和价格论的出发点。例如,一些古希腊学者在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上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这被马克思(1971)²⁵⁰视为是“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在实践中,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交易的日益频繁,有关经济贸易、消费以及借贷的限制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限制到逐渐宽松的转变过程,这充分体现在经院学派的学术观点上。不过,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分工和交换还不发达、经济联系不密切、人们的经济生活比较简单。相应地,当时学者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经济学科也就无从产生。

大约 15 世纪至 17 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早理论探讨,这就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者考察的对象是国家的财富增长问题,研究的领域是流通领域,他们的著作是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商业资本或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同时,为了与古代经济思想相区别,他们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占据支配地位达 200 年左右,它处于封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阶段,表述了一种流行于资本主义曙光时期即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纲领。如果说,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那么重商主义就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前史。随后,基于对重商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不满,出现了重视生产的重农学派。虽然它还是局限于农业社会的思维中,但其对生产领域的重视和研究开启了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先声。在很大程度上,以对立面出现的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共同构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它将经济学科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

1 古希腊时期的经济思想

(从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元年)

在文化和哲学上,西方社会“言必称希腊”,直到古典主义末期,对希腊语言和文学的通晓仍然是西方知识精英的标志。实际上,在主要的古典经济学家中,只有李嘉图不曾对希腊进行过研究,其他如斯密的《国富论》涉及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芝诺、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马尔萨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寻求对其人口理论的支持,穆勒曾翻译并提供了柏拉图 4 篇对话的注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斯皮格尔,1999)⁵。在很大程度上,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学说以及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也必须深入剖析古希腊的社会哲学观和认知思维,因为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以及基督教传统滋养了马克思的心灵。恩格斯(1971)³⁰⁻³¹强调,现代哲学或理论自然科学“迈步前进”就必须“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认识”,因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巡视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1.1 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思维特质

古希腊之所以能够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和思想,就在于它具有沟通东、西方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赋有天才色彩的民族。相应地,古希腊人积极吸收了东方的各种知识、古代加勒底人的数学知识以及小亚细亚等的美术和工艺知识,并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首先思索了政治自由等问题,从而为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学术思维奠定了理性主义基础。罗斯巴德(2012a)²说:“古希腊人是第一个运用他们的理性来系统地思考其周围世界的文明民族。希腊人是最早的哲学家,第一个试图深入思考和发现如何获得并证实关于世界的知识。其他的部落和人民都倾向于将自然事件归因于神的跋扈的无常怪想法……与此相反,古希腊人渴望运用他们的理性——他们的感觉观察和逻辑能力——去探究和认识他们的世界。”罗斑(2003)⁴则强调,希腊古代思想家们以哲学家的身份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些永久性问题。

1.1.1 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思维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持续了约 650 年(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到了公元前 750 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雅典的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 250 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并以二者为中心形成了两大城邦集团。

1. 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形成

希腊人定居以后就组成了小的城邦,各城邦之间几乎是独立的,并互相间经常开战。并且,城邦内是民主的,全体市民(除奴隶、非希腊人或外来人以外的全体成年男子)聚集于市场,

选举官吏,讨论公共事务,从而就确立了最早的民主制度,并由此孕育和发展出了民主思想。公元前5世纪左右,雅典因在希波战争中的角色而取得了希腊各城邦中的最高地位,同时,雅典的民主制在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500—前429年)执政时期达到黄金时代。这种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产生了成体系的政治科学,并造就了一批智者。

一般地,智者是古希腊中非常聪明的一群人,相当于现代的教授,他们代表了对人文主义的一种最早的自觉。相应地,智者从批判的角度对城邦事务进行争论,广泛思考了社会起源、法律本质以及道德和社会制度等。同时,智者学派的分析思路大致有3个层次:①划出一个社会秩序的领域,断言社会秩序概由人为而非神创;②人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借强权或经由相互约定来建立社会秩序与正义观念的,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滥觞;③划出一个高于人为法的自然法的领域,认为自然法是本源而人为法则是派生的,自然法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而高于人为的法律,是一种不分民族、国家、时代,对任何人都有效的法律,这是自然秩序原理和万民法的滥觞。正是由于智者从一个全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从而使得人类从巫术中解脱出来,这标志着人类逻辑时代的开始。同时,人类的逻辑时代也标志着个人作为主体的兴起,个人开始肩负起对社会思索的责任。

因此,古希腊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人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标志性概念有两个:①智者学派的代表人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90—前419年)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学说的滥觞(罗斑,2003)¹⁴⁸;②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把“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基本使命,以致他被视为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认为,正是通过个人取得独立思考的过程,通过解放个人的感情,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因而他强调道德教育和贤人政治。相应地,西塞罗则说,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就在于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

?

思考:西方社会的思维有何特质?

2. 古希腊的经济思维特征

就当时的经济分析而言,依现代眼光是微小的。古希腊学者所谓的经济仅仅是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直到亚里士多德提出“Chrematistics”一词才有了与现代经济学比较接近的含义,主要指商业活动的金钱方面。同时,古希腊学者把经济推理与他们有关国家和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而很少为专门的经济课题本身而研究经济课题。事实上,正如熊彼特(1991)⁸⁸所说:“希腊人的思想即使在最抽象的地方也总是围绕人类生活的具体问题而展开,这些生活问题又总是集中体现在希腊城邦观念上。”究其原因,对当时的希腊人而言,城邦是文明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其住房、服装、食品的消费支出相对微薄,而公共活动却比较丰富,公共建筑与节日庆典等的支出和消费占有很大部分。正因如此,“希腊哲学家实质上是政治哲学家,他是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个宇宙”(熊彼特,1991)⁸⁸。相应地,古希腊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即政治学;②关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即伦理学。

基于这种背景,古希腊的经济分析就具有强烈的“前市场”性质:一方面,古希腊思想家极为重视个人做出合理决策以及使人类幸福最大化的自我管制能力,从而对经济分析贡献了理性方法;另一方面,古希腊思想家又忽视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也没有形成有组织的交换,而市场功能是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当然,古希腊思想家主要关心经济和组织的效率,其世界观是

人类中心说,而不是商业中心说。同时,在古希腊文化中,又存在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微观”和“宏观”两种相反倾向:一方面,独裁者被赋予为社会的利益做出管理决策的权力,这使得理性计算得到强调和发展;另一方面,个体男性被赋予为每个家庭的基本决策者,古希腊的思想家非常重视私人家庭的管理(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¹⁰。正因如此,希腊社会关注对个人的控制因素,由此发展出了高超的管理艺术,并在发挥管理配置中制定了对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分析结构,从而产生了自我利益和享乐主义的理性计算。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中,不少成分来自于古希腊的思想:享乐主义计算、主观价值、递减的边际效用、效率和配置和分工等。

那么,我们又如何认识古希腊中的个人主义和反市场倾向之间的对立呢?要理解它,就要对属于私人领域的经济问题和属于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进行区分。在古希腊时代,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就城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参与决策,从这点上说,每个公民都是自由的,从而也就是个人主义的;但同时,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又具有配给性质,因而作为私人关系的经济领域往往是不自由的。这一点与现代社会恰恰相反,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私人领域得到了确实的保障,享有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但是,在公共事务方面却很少有实质性的参与权,而为少数人或集团所支配。正是基于这点差异,贡斯当(B. Constant, 1767—1830年)提出了两类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其中,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在公共事务中具有参与决策的自由,现代人则在私人生活领域享有不受干涉的自由。



思考:如何理解古希腊文化中的个人主义?

1.1.2 古希腊的哲学来源及三大时期特征

整个古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是苏格拉底,他介于智者和柏拉图之间,人们常常把希腊哲学分为前苏格拉底时期和后苏格拉底时期,以后的学者几乎都可看成是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宇宙和自然世界的关注,开始是以神话的外衣叙述客观世界史前的故事,后来则利用流行的有关万物恒变的观点叙述宇宙创始的形成,进而产生了对自然万物的设问和解答。相应地,人们往往将早期的希腊科学称为宇宙论时期,其哲学主要呈现为自然哲学,而社会经济思想并不丰富。

显然,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哲学奠定了西方思维的基本路径,因而自然哲学流派的思想对后来的经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 570—前 490 年)在“数”或“数学”中寻找永恒的实在,认为万物按照数的比例相互调适,彼此补充以达至和谐,这影响了柏拉图国家分工的理念,其对数字的偏好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所发展的公平交换理论的“数学”方法的基础。再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约公元前 530—前 470 年)关于宇宙和社会组织充满斗争和冲突的观念,成了 19 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中有关竞争性斗争保证适者生存理念的思想先驱,也是霍布斯野蛮丛林的先驱。此外,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前 370 年)的著作中则隐含了效用的相对性和效用递减的思想,他关于赞成私有财产的观点鼓舞了亚里士多德,甚至是伊壁鸠鲁的灵感源泉。

从根本上说,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就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流派,从而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特质。实际上,西方原初的求知动机是出于好奇心而对自然展开探索,例如,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Thales, 公元前 624—前 546 年)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公元前 610—前 546

年)、埃利亚学派的塞诺芬尼(Xenophanes,约公元前570—前480年)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15—前5世纪中叶以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毕达哥拉斯和希帕索斯(Hippasus,约公元前500)以及以弗所(也即爱非斯)学派的赫拉克利特和原子论派的德谟克利特等。而且,尽管在此之前的荷马神话中把历史看成是神的意志的产物,但荷马的诸神不制定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但赫拉克利特之后的西方思想中却呈现出明显的历史主义特征(波普尔,1999a)²⁹。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研究,自然哲学派把世界看成是一座以物质性的东西为建筑材料的巨型大厦,从而奠定了古希腊人最初的科学和理性。

当然,科学探讨开始只是在范围狭隘的学园內展开,保持作一种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好奇心的纯洁动机;但是,波斯战争导致希腊城邦遭受内在严峻考验,此时希腊人就开始寻求科学来解答自身的种种问题。此时,一些科学家开始走出校门而参加社会生活,并将自己学到的或发现的东西教给人们,这些人就被称为智者,而教学则成为他们的职业。相应地,此时科学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的内在性质以及待科学解决的问题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变成了社会力量,致力于解决实践生活中的问题。因此,希腊科学就进入了人类学时期,其特征将自然哲学流派的思想运用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上。

事实上,当时的智者学派就从一个全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并根据自然哲学的思维又在人类社会划出一个高于人为法的自然法的领域,认为自然法是本源而人为法是派生的,自然法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而高于人为的法律。其中,智者学派的领袖是普罗塔哥拉,他一生旅居各地并收徒传授修辞和论辩知识。同时,他与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结为挚友,曾为意大利南部的雅典殖民地图里城制定过法典。智者学派中的集大成者则是苏格拉底,他提出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普遍有效的真理存在的信念,进而将这种信念贯彻在实践中而形成道德的气质。

最后,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古希腊科学在今后的数百年里又逐渐进入两个新时期。一是体系化时期,这主要受到苏格拉底的理性信仰指引。苏格拉底的求知方式具有两大特点并为不同学者所承袭:一方面,他倾向于采取讨论的形式而不会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这种反思传统为色诺芬继承;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在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致,并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原则,这种演绎思维为柏拉图强化。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柏拉图等学者致力于著书立说,试图重建崩溃的城邦秩序,希腊科学进入了体系化时期。二是伦理学时期,这主要受到苏格拉底的道德实践指引,众多智者追随苏格拉底,通过科学洞见力图获得道德的生活行为准则。尤其是在泛希腊化时期,这些学者专注于个人的生活并出现了新的学派,希腊科学也就进入了伦理学时期。



思考:如何基于奥卡姆剃刀作理论的契合式发展?

1.1.3 古希腊的理性特质及二元演化

自然哲学塑造了古希腊的文化特征,进而赋予了古希腊人以理性思维。一般地,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包含了这样四大核心原则:①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反对信仰、偏见、习惯和任何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信念的根源;②现实是可知的,因为它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可理解的结构;③作为第一个原则的扩充,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④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同时,随着科学哲

学经历不同时期的发展,理性特征和思潮也开启了演变过程,进而进一步型塑了西方文化和思维。

1. 多元而批判的演化理性主义思潮

尽管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强调,人能够发现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的理性是全能的,特别是,道德和政治问题更加难以像宇宙问题那样进行鉴别。因此,古希腊哲学家往往专注于研究知识的性质、推理的方法(论理学)和推理的工具(演说术)。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哲家用推理方法潜心检验一切的事物,并形成了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精神,思想的竞争和交流得到推崇。事实上,古希腊著作中充满了存在、非存在、运动、一和多、同一性以及矛盾等术语,使用的方法也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这样,就形成了波普尔所称的“批判理性主义”,伯里将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期称为启蒙时代。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就自然哲学流派而言。在古希腊的“宇宙论时期”,就存在着爱奥尼亚学派、埃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赫拉克利特学派等多种流派的竞争,在争论中它们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譬如,塞诺芬尼就将爱奥尼亚传统带入了埃利亚学派之中。而且,除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尊重权威和长者以外,其他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争论,即使对其宗师的学说也要进行变更、修正,以及提出新观点和直率的批判。譬如,被称作希腊哲学奠基人的泰勒斯就他的学说宣称,“这就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我相信那是何物的方式,而你们要试图改进我的教义”。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则在其导师还活着的时候就公然开始对他的思想展开批判。

其次,就智者学派而言。在古希腊的“人类学时期”,智者们主要是以在各地讲学为生,为了吸引听众当然也就会相互辩论。正因如此,这些智者不但发展了“辩论术”的知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以人自身存在为基础的思辨传统。譬如,赫拉克利特就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Kratylos)则进一步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而且,由于后来智者学派的兴起,整个古希腊开始掀起了求知的欲望,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和自身的不足也成为当时的基本风气。譬如,第一位把自己称为“智者派”的思想家——普罗塔哥拉进一步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句表达了认知的相对性,它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提高到从来没有的高度,从而强调了认知的主体性意识,强调只有主观意识而无客观真理。

最后,作为古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苏格拉底在教授时往往采取讨论的形式,并且一般都不会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而只是说明某种固定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为此,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无知”,认为“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由于人们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按着事物的性质进行甄别而得来的。相应地,作为对话的技艺,辩证法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达关于事物的本性,这是“让言说本身产生辩论并导向普遍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同时,对话开始之初,并不是由一个现成的结论预先摆在那里,由言说者凭借自己的机辩而自圆其说;相反,一切结论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产生,它是一个逼近和敞亮真理的过程,关于事物本身的规定性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显现。事实上,正是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身上,海德格尔首先发现了一种把存在作为生长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经验,这也就是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

2. 一元而肯定的建构理性主义转化

经过人类学时期的过渡,古希腊思想就从宇宙论时期发展到体系化时期,理性特质也发生了从批判到肯定的转化。事实上,古希腊理性本身就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思考,后来的智者试图依据自然秩序来构建社会秩序,从而就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思潮。正因如此,古希腊哲人们

把大部分政治精力放在法律的建立和施行上,试图构建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进而。例如,梭伦、伯里克利等都是伟大的立法者,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哲学王的领导若要完善也必须体现于法律的理念。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古希腊自然哲学流派本身就潜含了归一论思维和自然主义发展观。①归一论思维强调,世界由物质构成的,同时社会又具有变动性。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把世界设想为一切事件或变化或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一切事物的综合,作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而且,一切物质实体(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与其说是物体,不如说是过程,它们都是火的变形。②自然主义发展观强调,自然世界存在一定的发展规律。例如,赫拉克利特就强调,世界上的每一个法则特别是火本身则都依据一个明确的法则而发展,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抵抗的法则,这类似于现代的自然法观点或者现代历史主义的进化法则。

其次,智者学派发展了法律的“人为创造说”和“强权即公理说”。随着智者们对人类理性的强调,人们逐渐不再把法律看成是恒定不变的,相反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律完全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东西,不但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而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特别是,一旦立法之权或者司法之权为某一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就没有其他手段来阻止这些掌权者借以打击其对手而维护自身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古希腊智者卡里克利斯(Callicles)等开始把“强者之权利”视为与“约定”法相对应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认为动物生活和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建立在强者对弱者持有先天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而人之法例规定则是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的。显然,弱者总是占多数,因而法律总是试图使人平等。再如,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就极力鼓吹“强权即公理”,他强调,法律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不过,这种强权显然是少数的帝王及其他统治者。这种强调人之理性的做法后来被柏拉图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柏拉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批判的理性主义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先验色彩的绝对理性。

最后,柏拉图进一步突出了人的理性能力。事实上,柏拉图在承袭赫拉克利特有关“宇宙是世界过程中各种事件的预定秩序”的历史主义思想之基础上,始作俑地把理性意识分化出来而使之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且取得了至上的地位。柏拉图认为,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人的道德意志可以违背历史命运的衰败法则,特别是立法者努力以其推理能力和道德意志结束政治腐败时期而重新回归黄金时代。而且,在柏拉图看来,形式或本质或始基是离开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的,正是在这种先验理性的支配下,柏拉图试图详尽地阐明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社会没有邪恶,因为它不衰败,也不变化,这就是他的理想国。显然,柏拉图设想的最优化国家是一种刚性、静态和理想的形态,他反对任何对这种理想国的偏离,从而形成了为波普尔所着重批判的封闭社会。熊彼特(1991)⁸⁹⁻⁹⁰就指出,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是一种作为艺术创造的城邦。

可见,自古希腊起,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两种理性主义传统,一种是批判性的,一种是肯定性的。其中,批判性理性传统后来逐渐转化为演化理性主义,而从肯定性理性传统中则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当然,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根本上认为,自然和社会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认知的;因此,肯定性的理性主义日后为西方社会的思维奠定了基本特质,并逐渐偏离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性传统。特别是,尽管柏拉图倡导人治,但这种人治也是以人的高度理性为基础的,是高度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直接应用。因此,后来柏拉图开创的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事实上,柏拉图最得意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任何事物、任何运动或变化